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 『意识形态领导权』

——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

孙民 著



人民出版社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 “意识形态领导权”

——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

孙民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边 娜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

孙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ISBN 978 - 7 - 01 - 011060 - 8

I . ①政… II . ①孙… III .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②政治哲学-研究 IV . ①B089. 1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9957 号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ZHENGZHIZHUXUE SHIYU ZHONG DE YISHIXINGTAI LINGDAO QUAN

——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

孙 民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245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1060 - 8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孙承叔



青年学者孙民博士的新著《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将要出版了，作为他的博士导师，我由衷地为他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它是直面时代的，正是怀着对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深切关怀，孙民选择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论著的主题，我认为它的意义有三：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的突破口。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西方革命失败的反思中诞生的。同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与危机，为什么俄国革命成功了，而西方革命却失败了？对此，葛兰西作了深刻的总结：因为西方有坚固的意识形态堡垒。由此证明第二国际，包括第三国际内部隐藏着的“经济决定论”倾向是错误的。在“经济决定论”看来，革命成功的根本条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只是政治与经济的伴随物，它是被决定的，正是这种忽视并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路线导致了西方革命的失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几乎同时意识到这一点。葛兰西的贡献是开辟了从意识形态领域理解西方社会并与之斗争的新路向。在

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具有三重含义:“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①黑格尔主要从经济角度理解市民社会,而葛兰西主要从第二、第三重含义理解市民社会,因此,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主要不是指经济领域,而是指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或公共领域,即公共意识形成的领域。他说:“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②“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③因此,“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④“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⑤,这就是葛兰西的基本结论。显然,葛兰西的社会分析框架与马克思、黑格尔相比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功能,而是在经济功能基础之上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路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总体上倾向于文化而非资本,与这一分析框架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从理论上讲,葛兰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路向上,关于这方面,孙民博士在论著中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一脉相承地推进着这一理论的发展,这一传承,我们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理论的主线。但葛兰西的影响主要是路向上的,他不仅向我们提出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任务,更主要的是开辟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新的视角,因为在经济资本主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② 葛兰西:《狱中书信》,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204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④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⑤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义之外还有一个文化资本主义,从这方面讲,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工业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单面社会”理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一路向上的思考,因为整个资本主义正是利用科学技术,通过文化工业,通过“仿真”、“拟真”、“拟像”等文化手段,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地控制人们的心理,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消费,从而批量地生产出“单面人”和“单面社会”。从某种意义讲,不了解文化资本主义,不了解意识形态对人们心理和消费的牵引作用,就不了解当代的西方社会。这是孙民论著选题的第一层意义。

孙民论著的第二层意义是通过意识形态路向的分析,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图和政治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和政党理论,卢卡奇提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柯尔施提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都表达了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努力。但在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看来,意识形态不仅是观念的东西,而且是国家机器,因此,这一路向的探索,直接导致了国家理论的革命。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①但是领导的实质是说服,是求得被领导者的同意,因此,国家在性质上不仅是暴力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即具有服务于公众的性质。葛兰西说:“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②也就是说,服务于公众并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国家合法性的根源。而一旦失去了公众的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支持,国家就会发生危机,这种危机在本质是“‘权威的危机’。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①由此他对国家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全新的理解。在第二国际或第三国际那里,“通常国家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为使人民群众同某种生产类型及特定时期经济相一致的专政或强制机关),而不是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某个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所谓非政治组织对整个民族、社会行使的领导权)的平衡。”^②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政治社会,它的最重要功能或性质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这就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确立了评判国家合法性的标准。市民社会在这里如果被看作“某个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所谓非政治组织对整个民族、社会行使的领导权”,那么这个领域实际上就是公共领域,即公共意见形成的领域,正是这一领域展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政治理念和全部政治智慧。因为政治民主就是建立在国家的新功能基础之上,政治民主就是达到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间平衡的最有力手段,葛兰西说:“政治民主力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关系的协化(指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统治)。”^③统治集团“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④因此,通过公共领域的斗争,建设民主国家,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理念和政治策略。与此必然相联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国家:“如果在国家中占优势的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那么这就表明领导集团达到饱和以后成了狭隘的小集团,他们努力的是永久保持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特权。”^⑤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② 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349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页。

④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198页。

⑤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正是在葛兰西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独裁主义国家的批判。霍克海默首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主义国家。”^①弗罗姆认为集权主义的本质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残酷地压迫人民”,“削弱真正的个性发展。”^②马尔库塞认为“法西斯国家就是法西斯社会,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极权主义的理性都来源于现存社会的结构。”^③赖希、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哈贝马斯在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展开了批判。赖希在《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中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自治,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自治而是集权,因而这种社会主义“代表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歪曲。不管它是多么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这种歪曲应归因于人民群众结构上的束手无策。”^④列斐伏尔在《论国家》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民主,“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种经常能够行使暴力和国家专制的手段。”^⑤斯大林“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给国家的衰亡罩上了一层阴影。”^⑥萨特也对斯大林的集权提出了批评:“斯大林就是党和国家,确实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党和国家是斯大林。”^⑦哈贝马斯批评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成了一党专制的合法的暴政。”^⑧一句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采取了批评和保留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是人民在国家事

-
-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页。
 - ② 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 ③ 马尔库塞:《否定》“序言”,波士顿1968年版,第12页。
 - ④ 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 ⑤ 列斐伏尔:《论国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37—138页。
 - ⑥ 列斐伏尔:《论国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38页。
 - ⑦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下),林襄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46页。
 - ⑧ 《理论与实践》,引自《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7页。

务中的公开主权,是人民政治意图的自由表达。

普兰查斯不同意把国家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镇压”,他认为“用这种‘国家=意识形态+镇压’的概念是永远也不能理解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的。”^①原因就在于国家不仅是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国家同时也包含经济机器和家庭生活机器。经济机器是理解国家阶级性质的更重要方面。但又“决不能把国家贬低成为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手里的强力机器或工具。”^②因为“这一甚至整个错误的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作用,是毫无用处的。”^③国家除了阶级属性,国家还具有相对自主性,因为“国家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秩序’或‘组织原则’。”^④“国家的生命可以被认作是……在基本集团的利益与从属集团的利益之间持续不断谋求并取代不稳定的平衡的过程。”^⑤因而国家在形式上表现为“国民大众国家”,“‘人民’本身被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本原,……并通过普选表现为‘普遍意愿’。”^⑥因此,普选制国家的真正功能是使分散的有产者个体组织成为统一的阶级,这即是“国民大众阶级国家的‘秘密’:资本家阶级的国家的那种制度化了的权力提供了它本身的阶级统一。”^⑦“与此同时,它也保证从政治上瓦解工人阶级。”^⑧结果,公开的阶级斗争退隐了,“在这种国家机构中,一切行事看来都好像并没有阶级‘斗争’存在。”^⑨由于“国家权

①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Nicos Poulantzas, Published by NLB, 1974, London. p. 303, 转引自金瑶梅、夏巍:《论普兰查斯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②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③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285页。

④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38页。

⑤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208页。

⑥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129页。

⑦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311—312页。

⑧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325页。

⑨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204页。

力是一种结构的整体。现有各种势力的平衡产生了国家的自主性。”^①因此，“以霸主阶级领导为特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它们的政治利益。”^②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这些也是人民群众争取到的东西）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③走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否则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④正是这一路向引发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领域的新的斗争策略，因为公共领域的直接民主，本质上就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

哈贝马斯认为整个社会由三部分组成，最底层是公众的生活世界，中间一层是社会的经济系统，最上层是社会的政治系统。在资本的统治下，“社会世界被歪曲成金钱和商品的外在世界。”^⑤“金钱的需要成为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就成了纯粹经济的了。……一种没有人性的力量支配着一切。”^⑥在晚期资本主义，一种明显的特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连成一体，并按金钱和权力的原则进行统治，其结果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人民群众边缘化。为了与这种现象斗争，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

-
- ①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页。
- ②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208页。
- ③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8, p. 256, 引自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 ④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8, p. 265, 引自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 ⑤ 马尔库塞：《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 ⑥ 列菲弗尔：《人类的产生》，引自《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就是公众意见得以形成的领域，哈贝马斯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①哈贝马斯赞同汉娜·阿伦特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政治权力有两种，一种是暴力，另一种才是真正的权力。暴力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行为之上的可能性”，而权力是“在自由交往中就一种共同的行动步骤取得一致的能力。”^②“‘权力’意味着为集体目标动员起来的被统治者的一致赞同，也就是他们对于政治领导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而‘强力’则意味着对于各种强制手段和办法的支配。”^③汉娜·阿伦特从国家制度的根源上指出：“正是人民的支持才能使权力变成一个国家的制度，……一旦人民的活生生的权力停止对它们的支持，它们马上就会僵死和腐朽。”^④因而暴力（或强力）离开了真正的权力就寸步难行，“没有一个政治领导能平安无虞地用强力来代替权力；它只有从未遭损坏的公共领域那里获得权力。”^⑤因此公共领域建设就成为政治权力建设的根本，它构成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其目的就是要为公众在公共领域求得话语权。公共领域“即使不是权力的产生者至少也是权力的合法性的产生者。”^⑥为了抵制金钱和权力向生活世界的殖民侵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页。

② 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朱亮译，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③ 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朱亮译，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157页。

④ 汉娜·阿伦特：《暴力论》，纽约1970年版，第41页，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⑤ 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朱亮译，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⑥ 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朱亮译，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人,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①这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就是公共领域。因此公共领域既是意识形态争夺领导权的领域,也是人民意志得以表达的领域,它构成真正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的支持,因此加强公共领域建设,其目的就是要提升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②这一方向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真正意图和目的。

孙民论著的第三层意义,是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建设提出了有益的思考。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后,资本的问题就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局限就在于回避对资本的批判,因此虽然他们严肃地思考了公共领域问题,但是在不触动资本的前提下,要实现真正的人民权力又谈何容易!“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③要资本家放弃资本的权力,而同民众一道平等地讨论社会同一性问题,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加强公共领域建设,却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途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但随之与市场相关的矛盾也不断产生,包括就业、生态、医保、养老、教育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政治腐败,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尖锐和外化,因为市场遵循的是资本原则,它在发展中是不会顾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并且是努力向政权渗透的。因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里最关键的是加强公共领域建设。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民幸福,我们国家的性质是人民民主国家,因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②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62页。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国家与人民在制度上的联盟。人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民对生活有最深切的体会,然而苦于分散和生活的压力而无暇求得与政府的沟通,政府虽有意解决民生问题,但疲于日常工作的应付和繁忙而无法捕捉最深切的民意,这就给资本的猖獗和官僚的寻租创造了条件。如果能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光耀于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与政治上层建筑间的中间环节,它构成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公共领域是民意得以形成的领域,是民权得以落实的领域,是民生得到关注的领域,也是民主得到发展的领域。是否培育、发展公共领域构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阿伦特说“正是人民的支持才能使权力变成一个国家的制度。”^①因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包含着向公共领域的延伸。如前所述,公共领域就是公共意志形成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所有的公民都有权自由、平等、公开地表达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一切意见,并在互相支持、批评、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共识。由于它是人民议政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公共领域也是人民民主权力得以行使的领域。由于人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因而他们反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最尖锐的问题,因而公共领域必然成为民生要求的表达领域。由于社会各界、公共舆论共同参与讨论、研究、分析、批判,因而它也是人民共识形成的重要领域。此外,由于人民参与并关心国家大事,因而它也成为公民自我培育、成长的领域。加上人民对事件的真切关心,因而也必然成为人民监督行政

^① 汉娜·阿伦特:《暴力论》,纽约 1970 年版,第 41 页,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9 页。

执行公意的领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不是可有可无的领域，相反它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政治特征，它是人民民主国家权力和意志的真正基础。哈贝马斯认为一种政权，“说它是一种暴政的话，那么它只表现为消灭公共领域的交往活动。”^①因而真正的民主政体，就必然表现为维护公共领域和发展公共领域，因为民主政体的力量正来自于公共领域。从原则的高度讲，公共领域不仅成为判别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试金石，而且成为判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标准。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是否自觉地建设公共领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集中体现在公共领域，因为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也是我们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只要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在一切关于民生、关于国家的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认真地听取人民意见，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让人民充分地知情议政，我们就有可能无往而不胜。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不仅要靠市场经济，而且要靠人民主权，而公共领域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环节。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最根本的是要形成人民共识，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人民意志，公共领域是最核心的环节。孙民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意识形态领导权，其意义也在这里。

孙民家境贫困，母亲长期患癌症，读博期间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家里仅靠他妻子的工资维持生活。但是在三年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他学习非常刻苦，起早贪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和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国外马克

^① 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朱亮译，参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3 页。

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在复旦三年的学习中,所修学科基本上都是优秀,获得了老师的普遍好评。参加工作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在重要期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文章。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他努力的必然结果。

逆境成才,是谈他的志向,但真正有影响的著作一定是直面时代,秉承先贤,同时又立足于人民沃土之中的。我期望有更多青年学者的有影响的论著问世。以此作序,互勉激励。

2012年3月26日

前　　言

一、问题凸现

20世纪70年代初,伦敦曾经出版过一套“政治科学中的核心概念书系”(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最先交稿出版的是普莱门纳兹的《意识形态》。那是一部短小精悍、诱人深思的小册子。它的最先出版标志着“意识形态”从此成了时代课题,它逐渐超越了“自由”、“民主”、“正义”、“权力”、“合法性”、“传统与权威”、“一致与共识”等概念而后来居上,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①

意识形态之所以能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这一理论的独创性见解。基于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意识形态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一般都对经济还原主义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力图

^① 参见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恢复文化、实践和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位置。”^①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从存在论而不是从知识论理解意识形态。知识论把意识形态看作对与错,真理与谬误,强调的是“知识”;存在论澄明意识形态的存在前提,把意识形态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社会现实生活”。^②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乃是人类的物质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的一种产物,一种衍生物。认识这一点,乃是揭开意识形态之谜的关键步骤”。^③概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史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存在论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认识到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利益的根本体现,是特定社会集团的价值彰显,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产物。这说明他们已经把意识形态纳入到政治哲学的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深化与拓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赋予意识形态政治伦理内涵。换言之,他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赋予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的内涵,并对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葛兰西是一个开拓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共产党总书记,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包括33本笔记本,2848页的《狱中札记》,使他永远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葛兰西的重要思想主要集中在这部著作中。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与领导权具有天然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

①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② 参见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94页。

③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下卷),白锡堃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